

福娣姐

陆天明

一九五七年我十四岁，正在上海读高一。到秋末初冬，整个上海突然沸腾起来……一场动员和组织青年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农民”的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在黄浦江两岸铺展开来。

按规定，十六岁才能报名。我是偷改了户口本上的年龄才得以“挤进”这个“有文化农民”的行列里的。出发前，团市委的一个同志把我和一个女生找到他办公室，他对那个女生说：“你是这一批人里年龄最大的。天明是年龄最小的。到了那边，有可能的话你要多照顾一下他。”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女生姓杨，居然还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学生。百里千里挑一才选得的表演系不读了，哭着喊着争着要跟我们一起去做“祖国有文化的农民”——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

我们一到皖南便直接被分到农民家里去了。每人去一家。大概是因为我年龄小，把我分到一高级农业社社长家里（那时候还没有人民公社）。可能也是觉得社长家生活条件会好一点，指望社长一家人能更好地照顾我这个“上海小孩”。为此，我再也没见到那位杨姓姐姐。

当年冬天兴修水利，在山里建水库。大坝的坝体全用土筑。土靠人挑去，然后重重砸下，力还要用得均匀，保证石方能平整砸下。土是否被夯实了，决定大坝的质量和水库的寿命。所以，这既是个技术活儿，又是个关键活儿，还得靠集体配合。正因为如此，一开始“稚嫩”的我只被安排去挑土。挑土当然就是个力气活儿，但从五六十斤一担增加到七八十斤一担，一天挑二三十担增加到挑一百多担。光着脚上坡下坡地跑，跑一个来回就是一二百米。“上海小孩”的脚底板上从满是血泡到终于结起一层厚茧。最后，才算是荣幸地被允许去参加打夯。现在回想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幸运的便是见到了福娣姐。

当时她大概也就十八九岁吧。人们告诉我她是乡长的儿媳。圆圆脸上长着一层淡淡的雀斑，留着那个年代最常见的马尾式一披撒发型。人们还悄悄告诉我，她当年可能还是乡长家的“养媳”，现在是乡里的团总支书记。

她显得沉默寡言。从没看到她像其他那些乡社干部那样，拿着马口铁皮做的喇叭筒站在工地的高处叫喊。她总是在挑土或打夯。天气再冷，也只穿着一身被汗湿透了的灰蓝色单衣或夹衣。一条七分裤，露出一截腿杆儿。和我们一样光着脚。她要是走在铲土，总会在我的筐里少铲两下；她要是去打夯，总会和我搭伴在一个角上。她力气大，又肯出力。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没等水库建成她就从工地上消失了。当换上其他人来和我搭伴打夯时，我才体会到和她搭伴在一个角上干活儿有多省力了。也才想到，她是有意来和我这个“上海小孩”搭伴的。也算是一种“团组织”对我这“小孩”“小知青”的一点照顾吧。

再见到她已是来年的初春了。山里开始采茶、做茶。住在茶场里，天不亮就得起身进山采野茶。（好多年后，自己喜欢上喝茶后，才知道这种常年在深山云雾笼罩中长大的野生茶树，从它身上采下的叶片做出的茶，

才是茶中的精品。）鲜嫩的叶片往往带露滴，采回后如果不是连夜做出，隔夜了就会变质，茶品就会急剧下降，卖不出好价。所以采回后，无论多少，当天都得赶紧做完。从天不亮进山采摘，往往要做到后半夜才能躺下，这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确实确实要比挑土打夯只要拼力气还要难以适应。何况进深山采野茶，一开始是集体搭伴走，可是只要一到茶区，就各自钻进密林中去找那些名贵的野茶树了，它们又偏偏喜欢长在没路可走的陡坡上岩缝中，能找到它们已属不易，而这支队伍已分散在山从的各种沟壑之中。单个的我就算采到了，又怎么能找得到回去的路呢？几乎所有的采茶大姐和大婶都劝我别去。但十四五岁、况且正在自学写诗的我能听她们的吗？能放过在这云雾山中偶遇“茶仙子”的机会吗？大姐大婶们对我只能无奈，摇头叹气。就在这时，福娣姐出现了。

她带着行李，锅碗瓢勺和粮袋，把地铺打在我的地铺旁。第二天进山时，她只对我说了句：“跟着我，跟紧了。”一路上再没说话。只是不时回过头来看看累得像一头病牛在呼哧带喘的我跟上了没有。依然是一身灰蓝布裤褂。不同的是，下边穿的不再是七分裤，而是一条长裤了。上山时我俩每人背着一个茶篓。走不多一会儿，她便把我那个茶篓夺了过去。很显然，她非常熟悉这片平时人迹罕至的山林。她总能找到树龄老、树形又好（容易攀摘）、生鲜嫩叶又多的野茶树。找到后，上树的是她，摘采的也是她。她不让让我上树的理由是，要是树杈不小心碰撞了你眼镜，乡里可

没地方再给你配，你不就成了睁眼瞎了？说着，她笑了。这是我认识她这么长时间以来，难得看到她的一次笑；也才发觉，一走进这种几乎没有人迹的地方，她反而变得活泛了。眼睛有灵气了。眼神也活泛了。后来才知道，她男人——那个乡长的儿子，县中里的一个高中生，一直对她不太好。理由好像是他俩不是自由恋爱。为此事，他总遭同学们嘲弄；再一个理由好像是嫌她一直也没能怀上……

下山前，两个茶篓都满了。我正犯愁时，她把长裤脱了。把两个裤管口打上结，把剩余的叶子全装进她裤子里，往脖子上架，便在这个在我看来绝对是陡峭绝壁似的山岩之间，带着一溜小跑下山去了，一左一右还挟着两个同样装满茶叶的篓子，随她不住地晃动。

在茶场做夜班——炒茶、揉茶、烘茶……社里给每人补半斤米做半夜饭吃。在那个缺油少肉的时代，半斤米对一个劳累了一整天又干了半宿活的男孩能顶个啥呀！她总是拉着我跟她搭伙做来吃。她是乡长的儿媳。虽然社里也只补她半斤，但她家有其他的好东西啊，比如干豌豆——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我才知道天底下竟然还有干豌豆煮米饭这么好吃的东西，又是七分饱，而是一条长裤了。上山时我俩每人背着一个茶篓。走不多一会儿，她便把我那个茶篓夺了过去。很显然，她非常熟悉这片平时人迹罕至的山林。她总能找到树龄老、树形又好（容易攀摘）、生鲜嫩叶又多的野茶树。找到后，上树的是她，摘采的也是她。她不让让我上树的理由是，要是树杈不小心碰撞了你眼镜，乡里可

我。她相信我是个懂事的男孩，自己会醒来。我又赖了一会儿，见她还是没啥动静，便悄悄睁开一点眼睛窥视她。只见她低着头，手里拿着的是我的眼镜，正全神贯注地在帮我擦拭着眼镜镜片。就这一霎那间，突然让我想起了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到的妈妈……我居然哽咽了。我不想让她看到我的眼泪，便猛地跳起，冲出茶场大门……

后来……我们这群当年只有十五六岁的“上海知青”一半多调到芜湖钢厂去当工人了，留下我们十几个去山村小学当老师。我去了一个深山沟里的小学。这个小学只有我一名老师，十几名大小不一、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有学生。但不久，却又把我调到乡中心小学去了。那儿的条件当然好得太多了。有六七名老师，甚至还有一名炊事员帮我们做饭。当时就有人告诉我，是乡团总支的领导跟县里乡里提出来，不能让十四五岁的上海知青独自一人待在深山沟里办学，不安全。他们没说这个乡团总支的领导是谁。但我想来想去，应该就是福娣姐。必须是福娣姐。

再后来……就再也见不到她了。甚至连她的消息也听不到了。有人说是她男人带她去了县城，又去了省城。也有人说是团县委把她调到县里专门做下乡知青的工作去了。我们这些人都但愿是后者。但没人说得定她究竟去了哪儿。也有人说，她终于怀上了乡长家的孩子。但难产，不幸死在产房了。我不信。但几十年来最终没得到过有关她任何确切的消息。这几十年，如果说我和我们这些人现如今还能硬硬脖子，“满腔热血”地喊一声“青春无悔”，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万万不能排除的便是当年我们有幸遇到过像福娣姐那样的人。正因为在中国的底层，存在着生活着千千万万福娣姐那样朴实善良的让人，让我们相信中国面前的路无论怎样的艰难曲折，中国是一定有希望的。也让我们时刻想到自己活着还有一份责任——对福娣姐的责任。对千千万万像福娣姐一样的人的责任。

福娣姐，你在哪儿？你还活着吗？如果你还活着，你也老了啊……

生活是流动的，人和人的相遇交往，有时候会像流星一样在眼前划过，转瞬不见，但对那抹光亮的记忆，却不易褪去。

两年前离我居住地不远处沿街开了一家菜店，规模不算大，大约五十平方米左右。店面朝西，踏进门，迎面一左溜是卖猪肉牛肉家禽等荤菜的摊位，右侧摊位摆的是蛋类及豆制品，右侧则是卖鱼虾等水产的，贴门左右两边是卖蔬菜的。店面是一群三十几到四十几岁的人合租的，结账各管各。

此地大小菜场菜店不算少，但多了一家菜店对周围人来说，总是带来了便利，家庭主妇主男们又喜欢货比三家找实惠。这家店的菜多是从崇明过来的，因此大家都称它为崇明店。崇明店的荤菜和蔬菜都比较新鲜且吃口好。我特别喜欢这家店的胡萝卜，虽然表面还带着泥土，但它和我小时候吃的自家田里种的胡萝卜一样，具有浓郁的胡萝卜味，可人家并没有标上“有机菜”三个字，开店初始几乎每天早上都是顾客盈门。

家畜摊位前，一男一女两位掌柜是夫妻。年龄都在大约三十五六岁，男的管卖牛肉，兼卖冰鲜的鸡鸭禽等，羊肉则是要到冬天才上柜。女的专管卖猪肉及猪下水。这对夫妻都长得壮实，一看都是有力气的人，否则那把斩肉的刀怎么能长久挥得动呢？但是两个人的性格却不同，男的是轻声慢语，开口即笑，这和他的长相有了反差，他高大威猛，皮肤黧黑，浓眉大眼，脑后缩起发束，有点像某些艺术家的做派。女的则是高嗓门，说话快人快语。

我不大买牛肉，但牛肉摊位前的兴旺常吸引我，一次我看到这位卖牛肉的大汉在为顾客切牛肉片，他右手握一把硕大的刀，左手按住一截牛肉，屏气凝神，即刻就把这段牛肉切成一片片纸样薄。长相虽粗功夫却细，匠人精神呀！我不由心生赞叹。因为有好人，我有时买了菜，也会在他的摊位前驻足一会儿，看他做生活。有一次他见我立在他摊前，就问我买点啥？我忽然想起，我妈是喜欢吃牛筋的，就问你有没有新鲜的牛筋，他有点抱歉地说，这两天没有拿牛筋，如果阿姨想要，我过天去拿，要不你给我一个电话，或者我留个电话给你，有了我通知你，你也可以打电话问我。说着他撕下旁边一张纸的边角，用圆珠笔写下一行字递给我。我拿起一看笑了起来，除了手机号码还有“金牛肉”三个字。我问，这个“金牛肉”，是你的名字呢，还是说你卖的是金牌牛肉？他笑着说，我姓金，但是我把名字写出来，阿姨不一定记得住我，我写上金牛肉，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卖牛肉的我呀！嗯，这实在也是个蛮有趣蛮聪明的人呢。

真正让我记住他的是有一天目睹了一件事。那天上午，有个老伯在猪肉摊前要求斩十块钱的夹心肉，女掌柜的功夫也好，切下一块肉称了称正好十元二角钱，掌柜的说就付十元钱吧。老人从袋里摸出一张十元票递上去，谁知女掌柜接过瞄了一眼大着嗓门说，你给我假钞干什么？换一张！老伯接回钞票，看了看有些委屈地说，我也不知道呀，这是别人找给我的。女掌柜说，谁给你假的找谁，你也不能把假的给我呀！老伯摸了摸口袋说，我袋里只有两块钱了，要不这肉我不要了。这时金牛肉过来了，拿起钞票看了一下对老伯说，老人家，这真是一张假钞呢，假钞是不能用的。说完当着老伯和众人的面，把手里这张假钞撕了个粉碎，又对老人说，这张假钞票不能再害人了，肉你还是拿去，以后注意点。见丈夫这番举动，他老婆向丈夫白了白眼，埋怨了一句：你就是大好人，败家子！也就作罢。

过后一天，我去崇明店买菜，晚了些，店里人不多，金牛肉也正好空着，我和他聊起了天，称赞他上次的举动，我说，你真是个好心肠的人呀！他笑了笑顺便和我说起了另一件事。说是有一天，有个老太太，在放鸡翅鸭腿的冷柜里，翻来倒去花了好一番工夫，只挑了一只鸭腿让他称上，待他称好，老太付

金牛肉

徐慧芬

了钱转身即走。旁边顾客眼尖，说老太太刚才偷偷往自己包里塞了两个鸡翅。金牛肉说，离开没几步的老太听到这话，像逃一样跑了，但这把年纪的人，追回来，让她把偷的东西拿出来，这张老脸往哪搁呢？我就对边上人说，那两个鸡翅她已付过钱了。我听了后说，怪不得你老婆说你是大好人呢！

他轻轻叹了口气说，我看到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就会想起乡下的妈妈爹爹，就说那个老太吧，一头白发，翻了半天只买了一个鸭腿，像她那样的老人，看来日子不太好吧。我问起金牛肉的父母，他说在苏北老家，还种着几亩地呢，又说来大城市做生意十多年了，也没有能力把二老接过来。

崇明店开了一段时间后，有的蔬菜摊位的生意有些冷清了，主要是一些蔬菜不及开头那般新鲜。卖相不好，顾客就看不上眼了。这也是有些原因的，因为崇明店开张时间不长，还没有和有些餐馆接上业务往来，当天卖不完的有些绿叶菜不舍得扔掉，明后天再卖，品相自然就差了。其他一些菜场菜店能保持蔬菜每日新鲜的，都是当天卖不完的蔬菜有餐馆接盘取走。

但金牛肉的摊位和他老婆的猪肉摊，生意却一直好，买菜人的眼光口舌自有辨别好坏的能力。有一天午饭后，我溜达到崇明店，想买点葱姜。这时店里顾客极少，卖菜卖鱼虾卖禽蛋卖制品的，包括金牛肉的老婆，一堆人围在一起说说笑笑在打扑克。只有金牛肉一个人，两只手臂圈起伏在柜台上，身体趴着，头埋在手臂里。是人不舒服吗？我有些好奇，经过他摊位前停了停。这时金牛肉的老婆就朝丈夫夫叫了起来：嗨，嗨！醒醒，醒醒！金牛肉抬起身子嘟囔了一句：我又没睡着！见我眼皮浮肿，眼睛里有血丝，一副疲劳相，就对他，你继续休息吧。他说昨晚没睡觉，所以这会儿没有顾客来就养养神。我问怎么夜里没睡呢？他告诉我这是经常的，他基本上隔一天就要往崇明去进货，通常都是前半夜往崇明赶，取了货，后半夜往此地赶，赶在早市开门前。为保证货的新鲜就不能偷懒啊……他说。我听了后有些心酸，由此想到，他脑后的发束，或许并不是艺术行为，而是没有闲暇时间常理发呀！劝他还是要注意休息，他却笑笑说已经习惯了。

最后一次见到金牛肉的那天，也是在下午，我去崇明店买鸡蛋，踏进门，就听到他和卖鸡蛋的在吵嘴，两人互不相让。只听卖鸡蛋的说他：我做我的生意关你什么事，你吃得太饱啦？他针锋相对：你骗人家我就要说你！原来是刚才有一位顾客来买鸡蛋，因为鸡蛋有好几个品种，那位顾客指着其中一种问，这蛋也是崇明的？卖鸡蛋的就说，我卖的蛋全部是从崇明来的。就为了这句话，顾客走后，金牛肉就说卖鸡蛋的在骗人，明明这种鸡蛋是从其他地方收来的，却骗人家是崇明鸡蛋。为此周围伙劝了他们好一会儿。

2020年，因为疫情，让人躲在家里不敢再轻易出门，我也开始了网上购菜。直到四月之后，疫情好转，第一次外出买菜，我就跑到了崇明店，只见两扇卷帘门紧闭。我转向另一家超市而去，遇到一位邻居，问她崇明店怎么关门了？她说，哎呀，你不知道呀？春节前崇明店的人回乡下之后再也没有开张过，早就关门啦……

现在，每次乘公交车往家回的时候，车子经过原先的崇明店，我总要朝窗外张望，门店卷帘门依然垂着。这时我总想起那位金牛肉……你和你的伙伴们在哪儿呢？一切还好吗？想到你的品行和为人，我想将来的生活总不会亏待你这样的人吧。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笔会

牛娃迎春

(剪纸)

孙平



共此年

陈怡伶

我就给弟弟买了半斤草莓。“你看，多新鲜多甜，一点不比25元一斤的差。”我摸摸弟弟圆滚滚的脑袋，振振有词。可惜弟弟并不稀罕，他始终致力于用少得可怜的零用钱去买已经褪了一块皮的杰克奥特曼，并为之努力。我跟他嚷：“道不同！道不同啊！”弟弟用袖套使劲揩了把快牵拉到下巴的鼻涕，突然说：“刚刚卖油条的陆阿姨说我比姐姐好看。”弟弟年幼却稳重，很少大声说话。此刻他的小眼睛在阳光下笑成了一条缝，我很不得给他红扑扑的酒窝里灌进两杯米酒，酸的那种。

弟弟刚出生时我曾使劲拍他那张胖床，因为他蜷着两条小胖腿保持青蛙游水的姿势，就是不看我。后来我才知道，他看了跟没看一样，眼忒小。因此持续下跌。因而到了正月初九初十时，

扭，不过弟弟说他喜欢那上头的小猪，我就得意洋洋天天给他套着。

傍晚时，街上就愈加热闹了，尽管这种热闹也都是别人家的。别人家的小孩穿了新衣在撒娇耍巧克力，别人家的妈妈在温温柔柔地准备年夜饭，别人家张灯结彩、灯火通明、欢声笑语……甚至震耳欲聋的炮竹声和姹紫嫣红的礼花，也都是别人家的。母亲当然也会在马不停蹄中想起我们，托人带回长长的满天星烟花。可我和弟弟还是更愿意看远处的咻的一声飞老远的大团圆。我们趴在窗口，呵着气，在窗户上画一朵又一朵大团圆，一直等母亲回家，一直。窗户关不严实，有风嗖嗖地往屋里灌，两个小小的身影在昏暗的灯光下，依偎着取暖。

“对对，就这样。姐姐你太矮了呀——咳咳。”弟弟说完这句时西风吹进嘴巴，把他呛得好一通咳。我赶紧跳下来奔过去，给他掖回脖。那是上次学着织的小东西，针脚整歪歪扭扭

扭，不过弟弟说他喜欢那上头的小猪，我就得意洋洋天天给他套着。

傍晚时，街上就愈加热闹了，尽管这种热闹也都是别人家的。别人家的小孩穿了新衣在撒娇耍巧克力，别人家的妈妈在温温柔柔地准备年夜饭，别人家张灯结彩、灯火通明、欢声笑语……甚至震耳欲聋的炮竹声和姹紫嫣红的礼花，也都是别人家的。母亲当然也会在马不停蹄中想起我们，托人带回长长的满天星烟花。可我和弟弟还是更愿意看远处的咻的一声飞老远的大团圆。我们趴在窗口，呵着气，在窗户上画一朵又一朵大团圆，一直等母亲回家，一直。窗户关不严实，有风嗖嗖地往屋里灌，两个小小的身影在昏暗的灯光下，依偎着取暖。

虽然年夜饭从来都是潦草的，但我们还是会说互祝祝福的话，比如努力，比如快乐，比如岁岁健康。母亲一般会闭着眼睛默默说一句，从来不出声。我们觉得肯定是多赚钱的意思，大人总是这么无聊。我和弟弟从来不清楚家里究竟欠下多少债务，没人告

诉我们，或者说，没人愿意让两个孩子知道。我也不知道，假装。我还清楚地记得，不管累得多睁不开眼睛，母亲都会当着我们的面读一封家信。那是万水千山外的父亲寄来的。母亲很轻轻地说，我们很静很静地听，我从没见过母亲如此时般美丽，她的眼里如含了一汪湖水，目光转向我们时，整个房间又像被笼罩在明月的柔光中。

奇怪的是，尽管记忆中的年被折叠成了小而模糊的形状，尽管之后我们日日好转，苦尽甘来；也拥有过花团锦簇的新衣服，也放过漫天璀璨的大团圆，也吃过母亲亲手烹制的大食小鲜，也有过其乐融融的阖家共欢；我和弟弟的内心深处，总还是难忘当年爬高落低贴的一副副对联，红肿着手端出的一碗碗菜汤，还有母亲含泪读信时的温柔美好。那些星星点点的关于爱的片段，总能在每一个冬夜里，伸出手臂，抚慰我。那些夜空中裹挟着的细碎的光芒，那些寒冷中夹带着的贴心的温暖，随着日历上红彤彤的除夕字样一起，一点一点，走近我。我不会告诉先生，尽管我沉默着点头，但不代表我真的不想回家。那个四十公里外魂牵梦萦的地方，始终承载着我和弟弟从小到大最大的心愿，也是母亲一直没有说出口的心愿——大团圆。

严格来说，童年甚至少年时光里，我家是没有过年这个概念的。就算有，也是年关。

印象当中的除夕总是极冷的，比前阵子的极寒天气还要冷上许多。父亲照旧是来不及赶回的，工程失利，一败涂地，他正焦头烂额奔波在千里外。母亲向来是忙得脚不沾地的，除了去店里帮忙，我和弟弟很难和这个“拼命三娘”好好说上几句话。

许是我们天性贪玩，总想着法子让自己开心。年三十，趁着正午客人少的空当，我解下围裙，和弟弟满菜场逛。手上的油渍一时半会并不能洗得彻底，熟稔的阿妈伯伯们遇到，总心疼地要送我们热乎乎的肉饼。山芋是铁皮炉里刚烤出来的，热乎乎边滋滋，是好吃又实用的暖手宝。一边捧着山芋，一边就等现做的铜鼓饼。靠近水果摊子一侧的蒋阿姨手艺最巧，她滴溜一下就顺着模具往食材里倒进正正好好的面粉，又滴溜一下倒入几滴香油，几下子就能把一个造型饱满、颜色诱人的铜鼓饼做出来。一口下去，那个齿颊间的香啊，差点让孩子们咬到舌尖。草莓是很贵的，不舍得买。但我们发现了个规律，大年夜最贵，可以上升到平时价格的三倍以上，一过初一，它就每天便宜两元的走势持续下跌。因而到了正月初九初十时，